

← (上接8版)

(Jared Diamond)的《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书中专为复活节岛的沉痛教训辟出一章的篇幅。

在“全球变迁的人类维度”这一视角下,复活节岛的古生态与历史研究逐渐成为公众话题。在《复活节岛,地球岛》中,保罗·巴恩和约翰·弗棱利明确地说:“(复活节岛人)为我们演示了一场实验,一场有关无节制人口增长、滥用资源、破坏环境、以及误以为信仰能确保未来的大型实验。”在此基调之下,几乎所有关于复活节岛的讲述,都是一个悲剧,人们不断地犯错误,黑夜不可避免地降临于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使用一个词来描述复活节岛的文化与社会进程:文化退化(cultural devolution)。

文化退化论者所依据的复活节岛历史,可基本概述为:人类砍伐棕榈林,目的是开辟农地、造独木舟、用作燃料、运输摩艾石像。他们无意间携带上岛的老鼠快速繁殖,吃尽棕榈果实,阻碍新林生长。当森林面积缩小,土地侵蚀加剧,河谷土壤减少,储水能力随之锐减。食物生产下降,导致竞争与冲突,为此反倒要雕造更多的摩艾。更多竞争,更严重的饥饿、战争和社会破碎。最终,摩艾为鸟人取代,摩艾不再被重视,逐渐倒伏。社会衰败使得人口剧减。破坏森林是灾难的起点,而这是复活节岛人民的主动行为。人类自造的生态灾难所引发的社会自我毁灭,是支持复活节岛文化退化论的基本历史叙述。

《复活节岛,地球岛》里有这么一段生动的文字:“站在最高处你可以看到全岛几乎任何地方。砍倒最后一棵树的人,明明看得清那就是最后一棵树,可他(或是她)还是砍倒了它。这才是令人忧惧的事,人类的贪婪竟是如此无边无际。自私似是与生俱来。自私导向求生,利他导向死亡,因而自私的基因优胜。……复活节岛人一点也不怀疑他们的神会替他们找到解决方案,正如今日我们倾向于依赖科学与技术之神。然而那些岛民最终还是陷入无路可走的绝境,我们也完全有可能落到同样的下场。”

这样的历史叙述、人文关怀和以小譬大,无疑已经占据主流地位。近30年来,讨论人类与环境关系,如果需要举一个反面的例子,通常都会是复活节岛。复活节岛为人类提高环保意识,为新时代的生态观念启蒙,以牺牲自我的方式做



尚未从采石场和加工场地运下山丘的摩艾。仰面倒下的摩艾石像的身体部分都已深埋土中。(罗新摄影)

出了不小的贡献。然而,如果上述的历史论述是存有疑问甚至是错误的,那么这样的牺牲对复活节岛是不是并不公平呢?进一步说,基于复活节岛个案所发展出来的种种学说,会不会因此而损失科学价值呢?

事实上,在太平洋群岛研究的学术圈内,对于《复活节岛,地球岛》那种把森林消失归咎于岛民贪婪的宏大叙事一直存在着质疑和驳斥。在《复活节岛,地球岛》出版后不久(1993年),格兰特·麦考尔(Grant McCall)就发表文章,提出小冰期的环境扰动所引发的严重干旱,很可能是导致拉帕努伊森林灭绝的主因。1998年,奥利阿克(Orliac)夫妇发表题为《复活节岛森林的消失:过度开发还是气候灾难?》,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干旱造成了“一个残酷而剧烈的危机:饥饿、高死亡率和深刻的社会失序”。

更有力的驳论来自罗莎琳德·亨特-安德森(Rosalind Hunter-Anderson),她1998年发表的《人与气候对于拉帕努伊的影响:真是人砍倒了那些树吗?》,对《复活节岛,地球岛》所代表的文化退化论历史观进行了全面批判。她依据广泛的民族志资料,指出复活节岛人本来有可持续的农业实践,也有办法控制土壤侵蚀,甚至包括对棕榈树的保护,因为棕榈树对于太平洋群岛农业来说有足够的重要性。针对《复活节岛,地球岛》所猜测的岛民砍树的理由,她指出有学者发现复活节岛造船不用棕榈树,而运输摩艾石像也不会导致森林大量损耗,因为平均一年建造的石像不会多于两个,而运输石像的圆木并非一次性消费品,完全可以存储起来反复使用。针对人类所携老鼠破坏棕榈林一说,她也予以批驳,指出与其说老鼠吃掉了棕榈的种子,不如说正是因为它们啃咬棕榈果的硬壳,反倒帮助了果实发芽。她根据自己建立的古气候变迁模型,主张复活节岛环境变化

是气候变化的结果,而这种气候变化开始于3000年前,公元400年以后才抵达复活节岛的玻利尼西亚人,是这一气候变化的承受者,而不是制造者。在她看来,复活节岛人在努力适应这种变化以求生存,复活节岛的历史,就是岛民适应大环境变迁的历史。

2002年第3期《世界考古》(World Archaeology)杂志发表了保罗·莱恩伯德(Paul Rainbird)的文章《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预言吗?——复活节岛的生态灾难与太平洋群岛环境变迁》,在上述质疑者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太平洋群岛为整体语境来观察复活节岛的生态变迁史。与亨特-安德森不同,莱恩伯德认为不是人类在适应环境,而是环境在适应人类。人类一直在改造环境以适应自己的需求。太平洋群岛的人民在千百年间一直在改变环境以求生存,因为不这样做他们就不能生存。既然改变环境是生存之道,那么复活节岛怎么可以例外?通行于玻利尼西亚其他岛屿的历史法则,自然也适用于复活节岛。以生存为目的而改变环境,并不意味着一定导向生态灾难。太平洋群岛其他地方同样经历了生态系统适应人类生存需求的重大变迁,但并没有导致生态灾难,也没有发生社会溃败,为什么要认定复活节岛是一个例外呢?

莱恩伯德最有力的驳论是:所谓的生态灾难和社会溃败,都发生在欧洲人到来之后,而不是之前。与欧洲人的接触,才是改变复活节岛社会文化命运的关键。《复活节岛,地球岛》一书所指出的食物竞争、部落战争与社会失序,从年代学的意义上说,都发生在欧洲人到达之后。1722年荷兰人罗格文见到的复活节岛上,摩艾崇拜仍在进行,岛民全无武装。可是1774年库克(Cook)船长来时,发现摩艾已经倒伏,岛民以黑曜石为武器,显示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

岛民传说提到古代的很多战争故事,这对研究者是一个误导,以为复活节岛历史上某个时期战事频仍,反映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然而对古代墓葬中大量骨骸的研究,却发现很少人是死于暴力,相当大比例的死因竟是欧洲人带来的病毒,特别是梅毒和天花。1862年来自秘鲁的掠奴船从复活节岛抓走了上千人,其中很多是上层人士,包括酋长和巫师,这之后岛上再没有人能够读写该岛独立发展起来的象形文。被掠为奴的岛民只有15个人最终返回复活节岛,而他们携带回来的天花病毒立即制造了更大的灾难。当时在岛上的欧洲传教士写道,复活节岛“整个成了停尸房”。1877年,曾经人口众多的复活节岛,只剩下110人,这在真正意义上摧毁了复活节岛的社会与文化,而不是岛民破坏棕榈林造成的。

莱恩伯德和亨特-安德森等人所批驳的,是把社会变化完全归因于环境变化。环境当然起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而且,就连环境变迁本身,也不能一味归结到岛民砍树。欧洲人带到岛上的不仅是病毒和新鲜的技术和物品,他们还引入了许多破坏性动物,包括兔、马、羊、猪等,他们也参与了棕榈林的消亡过程。也有研究者指出,欧洲人引入的奇异物品,扰乱了岛民的价值体系,引发社会内部忠诚与信任的危机。

总之,这些学者强调,假定复活节岛与世隔绝,并进一步假定因为与世隔绝所以最终自我毁灭,这种研究倾向是有问题的。在他们看来,复活节岛的历史悲剧,起因于18世纪与现代世界体系的突然接触,种种内外因素碰撞之下,复活节岛就从一个足以支撑数千乃至上万人的玻利尼西亚农业岛屿,变成经济凋敝、人口稀少、只能放牧牛羊的荒僻之地了,一如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欧洲探访者之所见。

到复活节岛之前,我对前述学术争议已略有涉猎。我当然没有能力判断孰是孰非,所以存心要把这个问题端给塞尔吉奥·拉普。吃饭时,我向他问起这个问题。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拉帕努伊的历史,的确是生态环境的灾难史,虽然对历史细节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这个历史对世界其他地方、其他人都有警示意义,这也算是拉帕努伊在现代世界里的独特价值。”

老实说,我有点意外。我本来以为,那些反对《复活节岛,地球岛》叙述立场的学者,多多少少是在为复活节岛的土著发声,替他们洗去历史的脏污。那么,作为土生土长的复活节岛人,拉普理应是欢迎这一学术倾向的。然而他没有,他接受的是主流论述。这让我问自己:学术理路为什么要与现实层面的这些因素挂钩呢?很显然拉普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不过,拉普自己的一个学术见解,却有利于反驳把生态灾难归咎于岛民砍伐棕榈树的传统说法。主张岛民砍树导致森林灭绝的学说,认为岛上最大宗的林木消耗,来自运输摩艾石像对圆木的需求。从18世纪的欧洲登岛者到现在的游客,看到岛上这么大、这么多的摩艾石像,无不对原始条件下的岛民如何把石像从火山锥采石场运到海边感到好奇。最早、最流行的解释都是欧亚大陆古文明中普遍流行的圆木轨道。可是,欧洲人见到的复活节岛已基本没有树木,这就催生了运输摩艾导致棕榈树被砍伐净尽的猜想。有意思的是,即使到今天,有关如何运输摩艾仍无定论。拉普提出一个假想:摩艾是走到海边的。

拉普说,他小时候问父亲,摩艾是怎么到海边的?父亲回答:根据岛上的传说,摩艾是走到海边的。“摩艾当然不会自己走去海边,但我一直记得这个传说,我相信一定有什么联系。”拉普说。很多年以后,当他把一个又一个摩艾重新放回Ahu平台上,他盯着石像的雕凿痕迹看,忽然发现石像的底部都有某种特意凿出的形状,似乎是为了便于石像摇晃而不是稳定。他突然联想起小时候听父亲说过的话,恍然大悟,于是提出了摩艾运输方法的新说:岛民利用重力作用,用绳索前后左右牵引,让石像自己摇

(下转10版) →